

# 桂馥与周永年交游考述\*

丁秀菊

(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相交久、相知厚者之一,为济南历城周永年。二人切磋问学,一起创办借书园,一起纂修《四库全书》,相识相交近30年,直至周永年辞世。他们共同筹办的借书园,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桂馥;周永年;切磋问学;《四库全书》;借书园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4)02-0117-08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云门,晚号老菴,别号读井复民,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任云南永平县令。擅长碑版考证,兼精书画诗文,尤工分隶篆刻,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著有《未谷诗集》、《说文解字义证》、《札朴》、《晚学集》、《历代石经略》、《续三十五举》、《缪篆分韵》等。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一字书愚,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贵州乡试副考官等。好读书,喜收藏,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撰有《儒藏说》18篇、《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借书园目录》、《借书园藏书目》等。

桂馥与周永年的相识,始于他外出游学初期。历史上,济南地区属于齐国,而济南郡治曾设在历城。明清时,济南成为山东省治,是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一个大枢纽站。桂馥自曲阜外出游学,济南是必经之地。这样,桂馥与同好读书的历城人周永年相识,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之事。二人年资相

仿,志趣相投,其后往来密切。他们切磋问学,一起筹建借书园,一同纂修《四库全书》等等,在共同的工作、研究中建立了深厚友谊。周永年对桂馥治学方向的影响尤其大,他们亦师亦友,亲如兄弟。

## 一、切磋问学

周永年“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于宫室制度、登降仪节讲求甚悉”<sup>①</sup>,经学造诣深厚。在治学方面,他既给桂馥以方向上的精心指导,也有具体问题的交流与探讨。

桂馥早年涉猎广泛,凡高头讲章、杂家帖括、唐宋文集等等无所不读,因此博学多识,“三十后与士大夫游,出应乡举,接谈对策,意气自豪”<sup>②</sup>。对此,周永年却非常不屑,指出桂馥不喜治经、博而不精的弊端。关于这一点,桂馥在给阮元的信中曾有追述。在《上阮学使书》中,桂馥写到:

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帖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取唐以来文集说部,泛滥读之,

\* 收稿日期:2014-03-02

作者简介:丁秀菊(1965-),女,山东平阴人,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编审,博士。

①[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②[清]桂馥:《上阮学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3页。

十年不休。三十后与士大夫游,出应乡举,接谈对策,意气自豪。周书昌见嘲云:“君因不喜帖括,遂不治经,得毋恶屋及鹊邪?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愿君三思。”馥负气不从也。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读经传,故其学有根据。”又见丁小雅自讼云:“贪多易忘,安得无错!”馥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前所读书又决然舍去,取注疏伏而读之,乃知万事皆本于经也。<sup>①</sup>

桂馥生活的乾嘉时期,正是清代朴学的大盛期。诚如梁启超所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sup>②</sup>桂馥只知道“泛滥读之”,不事治经,自然会遭到周永年的嘲讽。不过,这的确给桂馥指明了正确的治学方向。

清儒治经推崇汉儒。他们认为,汉儒近古,其解经更接近于事实,更接近于古人的思想。如阮元曰:“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乃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之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sup>③</sup>汉代与清代相隔1500余年,要想正确理解汉代经说,必须借助文字训诂之学。所以清儒治经,倡导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通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方面的研究来疏通、证明汉儒经说。惠栋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sup>④</sup>戴震曰:“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

也。”<sup>⑤</sup>阮元曰:“舍诂求经,其经不实。”<sup>⑥</sup>又:“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错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鄙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踰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sup>⑦</sup>等等。受他们的影响,桂馥认识到了训诂之于治经的重要性,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sup>⑧</sup>,开始走向了以训诂而明经的治学之路。可以说,周永年的当头棒喝,为桂馥打开了全新的治学门径。

在周永年、戴震、丁杰等的教导、影响下,桂馥治学由博而精,开始走上了研治《说文》的漫漫长路。研治《说文》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博引经籍“义证”《说文》,更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既要广览、爬梳各种古代文献典籍,又要将每个有关的字词、义项予以分类、整理,这在全靠手工抄写的清代谈何容易!仅凭一己之力,又需要多少时间?桂馥遍读经书典籍,“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sup>⑨</sup>,矻矻孜孜校治《说文》20年后,依然未能穷其根柢,一度陷入进退无措的尴尬境地。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周永年予以开示、鼓励。周永年说到:

昔郭景纯注《尔雅》十八年而成,馥之学万不及景纯,而《说文》名物十倍《尔雅》,扬子云所谓白纷如也。<sup>⑩</sup>

“一言点醒梦中人。”周永年这番话,犹如

①[清]桂馥:《上阮学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3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③[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7页。

④[清]惠栋:《九经古义原序》,《四库全书》第191册《九经古义》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⑤[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页。

⑥[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7页。

⑦[清]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7页。

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3页。

⑨[清]蒋祥埏:《桂君未谷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4页。

⑩[清]桂馥:《上阮学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3页。

醍醐灌顶,令桂馥顿开茅塞。随后,桂馥更加用心于《说文》校治,前后花费40年,终于撰成皇皇巨著《说文解字义证》50卷。可以说,桂馥之所以专事于《说文》研究,周永年功不可没。

周永年嗜书多闻,过目成诵,却不喜著书立说,“自谓文拙,不存稿”<sup>①</sup>。在与桂馥同游书肆时,他就著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此,桂馥详细记述曰:

往客都门,与周君书昌同游书肆,见其善本皆高阁,又列布散本于门外木板上,谓之“书摊”,皆俗书。周君戏曰:“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辈书摊上也。”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说盈箱累案,漫无关要,近代益多,枉费笔札耳。今与君约,无复效尤。”馥曰:“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顿吟杂录》、《潜丘札记》,皆能沾溉后学,说部非不可为,亦视其说何如耳。”<sup>②</sup>

二人的对话饶有意味。周永年认为,如果著述漫无关要,是徒费笔墨,还有可能沦落为书摊;桂馥认为,著述不是不可,关键在于如何著、如何说。事实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看法是一致的,即著述要小心谨慎,要有根有据,要“沾溉后学”、有益于世。这一点,在他们的治学实践中有充分体现:周永年“自谓文拙,不存稿”,因此只有《儒藏说》传世。其“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sup>③</sup>的观点,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并对后世的藏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桂馥则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审慎细致、严谨务实的方针以治学,撰述了《历代石经略》、《续三十五举》、《缪篆分韵》、《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签注》、《检说文难字法》、《说文部首读》、《说文解字校勘记残

稿》、《晚学集》、《未谷诗集》、《札朴》等多部著作。桂馥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极富学术价值,从而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与周永年的约定。

周永年是桂馥的治学导师,也是桂馥的同道益友。二人常常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流看法,如“堪舆”问题。“堪舆”即风水,指住宅基地或墓地的形势,也指相宅相墓之法,非常高深玄奥。周永年知其“易晓而难精”,因此劝桂馥谨慎对待,切勿造次。曰:“前来札言堪舆事,此事易晓而难精,慎,勿造次。《灵城精义》等书,亦非一时所能即解。《萧仙全书》宜细玩之,中多微言也。抄书之事,终多掣其肘者,亦所谓得寸则寸耳。南涧寄书一部又一纸,新有自广中来者,言去其潮阳,惟恐不速,海疆俸满,或亦可循例升也。”<sup>④</sup>又如泰山的走向问题,《山东通志》称“泰山越海而来,与撼龙之说异”,周永年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泰山“从河南来,由徐之吕梁过峡”,并因此叮嘱桂馥实地考察目验“自吕梁至泰山一节”。桂馥遵嘱而行,“自陕而东,自徐而北,凡大龙经行河南、山东之地,皆得游览”,然后“审其行度”,最后得出确凿结论曰:“龙自河南东境折而北,将起沂州诸山,先伏于凤徐,故黄河得由吕梁穿过。此等大干水不能劫,但为龙所用尔。或谓黄河南徙,齐鲁遂衰。”<sup>⑤</sup>等等。在不断讨论、切磋中,他们廓清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并由此增进了了解,深化了感情。

## 二、纂修《四库全书》

周永年广览经史百家,学识渊博,“其文斯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窥其意,将尽致古今载籍,以掇其精而

①[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②[清]桂馥:《札朴序》,桂馥:《札朴》,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页。

③[清]周永年:《儒藏说》,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6页。

④[清]周永年:《致桂未谷函》,王献唐辑:《顾黄书寮杂记》,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3页。

⑤[清]桂馥:《答周书昌论山东地脉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6页。

诘其蔽,而不仅以多藏为富,是岂惟齐鲁之杰”<sup>①</sup>。因早年与益都人李文藻一起编修《历城县志》,所以他在校勘学、目录学方面卓有建树。清廷设立四库馆后,周永年以目录校勘见长被特诏入馆,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等职,以协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周永年成为四库馆臣。当时,四库馆设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各有分工。《四库全书总目》一书由纪昀总其成,戴震负责经部,邵晋涵负责史部,纪昀负责集部,周永年负责子部。

周永年在四库馆的职衔是“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因此,周永年的主要任务是从《大典》中搜辑佚书,“有其书虽存,而篇章残缺,据《大典》辑而补之”者;“或其书虽全,而讹脱不可读,据《大典》雠而正之”者<sup>②</sup>。总之,校勘《永乐大典》是一项非常浩大、非常繁重、非常严肃的工作,需要集合众人之力才能完成。周永年是当世著名学者,所以消息一出,应者云集。周永年“在京时,从学者甚多:始则教以立品,谓‘读古人书即当学古人行事,若徒取其词藻而弃其精华,则去为学之道远矣。’次则教以兵农、礼乐之异同,刑法、赋税之沿革”<sup>③</sup>。“当是时,海内学人集辇下,皆欲纳交,投刺踵门。”<sup>④</sup>能跟随周永年左右,是当时众多学者的愿望。

桂馥因学识宏富、博见多闻而倍受赏识,担任了周永年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永年《四库全书》子部的纂修工作。关于其间的工作情况,桂馥在给龚丽正的信中略有涉及,曰:

今将远别,有望于足下者三事,幸留意。当四库馆初开,真定梁氏献《孟子赵

注章旨》及宋槧《说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说文》非遗书,不为上。有识者抄其章旨,流布世间,《说文》则仍归梁氏。馥所见《说文》不过元明间刻本,若就梁本证毛刻之误,讲小学者所大愿也。《永乐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修本,馥案:原本即孙强本,尝恨宋人阑入之字不加别白,后人无从持择。幸孙本犹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尚可依韵录出,此又小学家所深望也。白云观有道藏全本,就观中翻披,于儒书多所推证,不可谓非钩沉探微之助也。此三事皆留京所急,他日违去,无能为力。<sup>⑤</sup>

可以看出,桂馥在四库馆初开时入馆,曾进行过赵岐《孟子章句》、《说文解字》、《玉篇》等著述的校勘工作。

辑佚《永乐大典》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面对大家的避难就易、敷衍塞责,周永年一如既往地严谨认真,“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sup>⑥</sup>。所以,在他手下工作,定当勤勉用心,不能有丝毫懈怠。如为编纂《四部考》一书,桂馥一行人查找资料、审校文稿常常焚膏继晷、通宵达旦。对此,桂馥曾记述说:

(先生)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佣工七十人,日抄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sup>⑦</sup>

为完成这部《四部考》,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借出秘藏珍本,雇人日夜抄写。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为赶进度、保质量,桂馥等人加班加点、烧灯校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周永年、桂馥等人的认真细致、勤勉用心,使得子部能够“综录独富而错误极少”,得到世人的一

①[清]沈起元:《题〈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序》,毛承霖纂修:《续修历城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历城县志局铅印本。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63页。

③《历城县志采访册》。

④[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⑤[清]桂馥:《与龚礼部丽正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7页。

⑥[清]章学诚:《周书昌别传》,《章氏遗书》卷一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1页。

⑦[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致好评。李慈铭在《越縠堂日记·孟学斋日记》中说:“《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极毕生之力,吾乡章实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子部综录独富。”《清史稿》也详细记录了周永年的不朽功绩,曰:“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周永年的卓越功绩浸透着桂馥等人的心血和汗水;周永年、桂馥等人的通力合作与辛苦付出,成就了“综录独富而错误极少”的《四库》子部。

### 三、创办借书园

借书园的创办缘于周永年的藏书癖好。据载,周永年自幼就喜欢读书,四五岁时曾自己买了一本《庄子》,之后与书结缘,“少长,于书无所不窥,而又笃嗜内典,无远近物色梵菜贝叶,度置所居小楼几半焉”<sup>①</sup>。在济南泺源书院读书时,其水西书屋藏书已达数千卷,他还编制了《水西书屋藏书目录》,成为山东小有名气的藏书家。沈起元称赏他说:“百无嗜好,惟嗜书。历下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sup>②</sup>但周永年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希望把天下所有的儒学书籍藏聚一起,能够给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一方理想的读书天地,于“寒士则供其食饮”,“极寒者并量给束修,免其内顾之忧”。怀揣着这样一个美好愿望,周永年开始筹办借书园。在筹办过程中,他倾其所有用来买书、藏书,以致生活陷入困窘。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周永年邀请桂馥参与其中。对此,桂馥记述说:

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sup>③</sup>

借书园从筹划至建成,历经曲折,将近20年。周永年第一次邀约桂馥建园,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年夏天,桂馥游历蒙山时接到了周永年的来信,约他前往青州考察建园地址,“昔登蒙山……时周永年寄书,邀余往青州辟借书园”<sup>④</sup>。可惜的是,青州选址没有成功。乾隆三十六年(1771),周永年高中进士。他没有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走入仕之路,而是依然痴迷于创办借书园。怀揣“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宏伟理想,他满载藏书回归故里,前往徂徕山建园。周永年的这一壮举,令桂馥十分钦佩。桂馥曾追述自己当时追随其后的意愿曰:

我亦远尘世,懒曳侯门裾。

幸免婚嫁累,将依守道居。

名理共涵濡,疑义相爬梳。

山空岁月闲,可以息微躯。<sup>⑤</sup>

徂徕山位于泰山东南方向,山势雄伟,峰峦嵯峨,环境优美,古迹众多。《诗经·鲁颂》有“徂徕之松”的诗句,唐朝大诗人李白也曾隐居于此。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次也没有成功。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人才得偿夙愿。

乾隆五十四年(1789),桂馥乡试中举后寓居济南,并同颜崇槩、叶承谦、黄琬、陈秉灼、沈默等友人筹划兴建了潭西精舍。潭西精舍位于五龙潭内,环境幽雅,非常适合文人墨客读书会友。于是这最后一次,桂馥与周永年把借书园

①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历城县志局铅印本,第29页。

②[清]叶昌炽:《题水西书屋藏书目录后》,《藏书纪事诗》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17页。

③[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④[清]桂馥:《题萧尺木画卷稿》,转引自王绍曾:《山东藏书家史略》,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⑤[清]桂馥:《送周进士永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未谷诗集》卷二《老苕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0页。

的地址定在了五龙潭畔<sup>①</sup>。

桂馥出资帮助周永年买田建园,并且把自己的多年珍藏全部捐献出来,其中包括珍贵的宋种德堂刊本《说文解字韵谱》5册1函、影元抄本《紫云增修礼部韵略释疑》5卷、旧抄本《雁门集》8卷等<sup>②</sup>,极大地丰富了借书园的藏书。当然,周永年所出藏书居多<sup>③</sup>。集合二人所藏,借书园的藏书多达十万余卷。为方便读者查阅,周永年还特意编写了《借书园书目》,由好友、著名学者章学诚为之撰序。《借书园书目》著录图书2621部,分别为“国朝列圣御制诸书”17种,经部638种,史部332种,子部771种,集部865种。其中,有1192种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280种为《四库存目》著录。此外,有852种今日尚有传本,有297种尚未查得。至今,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有借书园藏本明代范善濬的《中州全韵》<sup>④</sup>,山东省图书馆藏有借书园藏本明代胡应麟的《诗薮》,等等。

借书园的成功创办,是周永年“儒藏说”的具体实践,是桂馥重然诺的充分体现,也是桂馥与周永年友谊的历史见证。从选址到开办,从聚书到管理,事无巨细,二人全程参与。可以说,借书园创办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二人的心血和汗水,都见证着二人的勤勉与良苦用心。对这一开拓性创举,著名学者阮元、蒋祥墀、钱林、李元度、孔宪彝、陈庆镛等多有称述。如阮元《儒林传稿》卷三:“馥与历城周永年同置借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于其中。”蒋祥墀:《桂君未谷传》:“复与济南周书昌先生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借书园以资

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其诱掖后进甚笃。”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九:“馥尝与历城周永年置借书园,藏书以资来学,祠汉经师于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馥)又与济南周书昌友,诱接后进甚笃。”孔宪彝《韩斋文稿》卷四:“(馥)尝与周编修约,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以下诸人,而藏书其中,以招致来学。”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十一:“尝与历城周永年同置籍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于其中。”桂馥与周永年的这一创举,开启了中国图书馆史的第一页。

#### 四、相知相惜

周永年比桂馥长6岁,二人是朋友,也是兄弟。桂馥曾寄住周永年家,周永年也曾造访桂馥家,彼此非常熟悉,对父辈也相当了解。乾隆四十年(1775),桂馥父亲去世,周永年作《桂先生墓表》以示纪念。在《桂先生墓表》中,周永年饱含感情回忆了他与桂父的相识及桂父的一生,表达了由衷敬意。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周永年母亲去世,桂馥作《王太宜人墓志铭》以示纪念。在铭文中,桂馥满怀深情地描述了王太宜人的生平、功绩等,歌颂、赞美了王太宜人的克勤克俭、朴实善良、任劳任怨以及慈爱仁义等美好品德,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敬意:“补衣以覆邻媪,减食以活乞人,仁心为质,不匮惟勤,归于真宅,永庇后昆。”<sup>⑤</sup>

长期的交往相处,使他们彼此了解、互相欣赏。除工作外,二人或把酒畅饮,或缮写诗文,或外出游历,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岁月。乾

①关于借书园地址,有多种说法。如清叶昌炽认为,借书园在泇源书院西侧,今五龙潭附近。(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纪周永年诗》:“清梵云中傍拓提,借书园在泇源西。伏生孔郑同堂祀,两汉经师半鲁齐。”)徐北文认为,借书园在今济南市五龙潭畔的“潭西精舍”(徐北文在《林汲山人周永年》一文中说:周永年“想联合自己的友好,共同在济南成立一所‘借书园’。其地址是在五龙潭畔……他的好友桂馥就和友人们在五龙潭畔修建了‘潭西精舍’,并书写了《潭西精舍记》的石碑文字。”详见济南市出版办公室编:《济南名士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绍曾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王绍曾:《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见《山东图书馆季刊》1981年第2期),等等。今从徐北文说。

②许慧娟、叶薇:《文献家周永年聚书校书刻书考》,《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关于借书园的藏书,桂馥《周先生传》言周永年“积书五万卷”,章学诚的《周书昌别传》则说“积卷殆近十万”。这在统计时间上可能存在差别:桂馥所说的五万卷可能是他所见的周永年在济南时的藏书量,章学诚所说的近十万卷可能是周永年居京时的藏书量(详见申斌、尹承:《清代学者周永年研究四题》,《山东图书馆季刊》2010年第1期)。

④张雷、李艳秋:《周永年事迹补记》,《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年第2期。

⑤[清]桂馥:《王太宜人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1458册《晚学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6-707页。

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桂馥《续三十五举》著成后,周永年与翁方纲、卢文昭、王念孙、丁杰、程晋芳、刘端临、陈竹庵等前往观赏、祝贺;乾隆五十六年(1791),周永年作《东岳庙文昌阁记》,立碑时由桂馥亲手书丹<sup>①</sup>;他们还一同祭拜过图裕轩墓<sup>②</sup>;等等。二人相知相惜,感情笃厚。这都深深铭刻在桂馥的脑海中。在《缮写南涧诗文了简林汲》、《久雨初晴同林汲夜坐》、《岁除忆林汲》等诗中,桂馥均有记述。

周永年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享年62岁。该年,桂馥有《送周进士永年》诗与《周先生传》一文,深情记述了周永年的一生。在《送周进士永年》诗中,桂馥写到:

下士昧讲授,衮衮多歧途。  
气胜角猛兽,身后同枯鱼。  
君乃崇实学,群言归扫除。  
经术探理窟,百氏如贯珠。  
中立障狂澜,心苦道何孤。  
寂寞三十载,骑驴京华趋。  
一举擢高科,对策匹江都。  
声名动日下,君心冲若虚。  
脱然返故乡,惟载满船书。  
徂徕山色好,独往置田庐。  
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  
传之得其人,犹胜儿孙愚。  
来者未可知,此心与之俱。  
……  
名理共涵濡,疑义相爬梳。  
山空岁月闲,可以息馼馼。

送君千古心,樽酒空踟蹰。<sup>③</sup>

周永年的一生平凡而崇高,贫穷而富有。他潜心问学,成绩卓著而虚怀若谷;他无私忘我,置田建园而倾其所有;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而独守寂寞。桂馥相当了解周永年,在周永年逝世后特作《周先生传》以记。在文中,桂馥写道:“朋辈多习浮文,逐虚誉,先生刊落华藻,独含内美,学思坚明,识解朗悟,汪汪千顷波,岂涧溪沼沚之可徒涉乎?”<sup>④</sup>可以说,这是对周永年一生最好的概括。

## 五、结语

桂馥一生最辉煌的成绩,是撰著了《说文解字义证》50卷。而这项工程的启动与完成,与周永年的开导、支持密不可分。周永年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倡导“儒藏说”;二是创办借书园;三是纂修《四库全书》。其中两件,是在桂馥的参与、协助下完成的。他们志同道合、性情相投,相识相知相惜,亦师亦友亦兄。

桂馥与周永年的交游,只是其交游的一个缩影。桂馥一生交友众多,除周永年外,相交深厚者还有戴震、翁方纲、纪昀、朱筠、丁杰、武亿、黄易、孙星衍、伊秉绶、洪亮吉、黄景仁、程瑶田、张问陶、王念孙等30余位。其中,有官宦名流,有经学大家,也有金石书法同好者等等。他们常相集会,或考订碑版,或辨难析疑,或切磋问学,或把酒作诗。在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中,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帮助,从而积极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蓬勃发展。

<sup>①</sup>参见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卷三十《金石考》,民国十五年(1926)历城县志局铅印本,第29页。

<sup>②</sup>[清]桂馥《拜图裕轩先生墓》:“先生讳图答布,以翰林院学士告休,无子。及病笃,弃家人延宁庵,卒于庵中。门人刘给谏湄即于庵内建祠,庵外修墓。馥与周编修永年同谒,距先生卒已十余年矣。”图裕轩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若依桂馥所说图裕轩卒后十年拜谒,当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元年(1796);而周永年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去世。由此可知,桂馥所说拜祭图裕轩墓的时间,当有误。

<sup>③</sup>[清]桂馥:《送周进士永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未谷诗集》卷二《老菴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0页。

<sup>④</sup>[清]桂馥:《周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晚学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

## Study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Gui Fu and Zhou Yongnian

Ding Xiuju

(Editorial Boar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Gui Fu was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paleographer, calligrapher, seal cutter and one of the four prestigious experts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uowen Jiez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or, he cherished an intense fondness for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and had a very good command of both the seal and the official script while, as said above, he was well known for his research and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he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had many acquaintances, and was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scholars all over the country. Among them, Zhou Yongnian from Licheng County, Jinan Prefecture, was one of his bosom friends, with whom he was on the most intimate terms and remained contact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 two of them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by exchanging views on and comparing notes on knowledge. And the two of them set up and established a book – lending garden (library), and compiled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ogether*. The friend ship between them lasted for nearly 30 long years until Zhou passed away. In a word, the book – lending garden established by both of them was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Key words:** Gui Fu; Zhou Yongnian;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library

责任编辑:孙昕光